

天壤公言录*

一

一年以前，这部书已经出版日文本。主編者是井上清、卫藤沈吉，书名叫《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1988年9月东京原书房发行。中文本《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的内容、编排与日文本全部一样，只是把前者的序言、跋语移作附录了。书名叫《对谈录》，是为了突出它是中日学者共同讨论的结果。学术问题，有时要夹带点咬文嚼字。“对谈”有异于时下流行的“对话”，更符合于双方共同讨论的实际情况。

关于诞生这部书的1987年学术讨论会，我曾写有一篇短文，予以评价，题目叫《从京都到东京——记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载在《中共党史研究》创

* 这是为《中日学者对谈录》撰写的序言。曾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刊号上。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先生、亚细亚大学校长兼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卫藤沈吉先生，他们主持的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东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以及日本学术界的其他朋友，为主办这次讨论会，做了卓越的组织准备工作。参加讨论会的中日学者，一致认为那次讨论会开得很圆满，很成功。井上清先生在《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跋语中，引述了我在讨论会结束后在庆应大学楼前向与会日本学者告别时说的话：

京都创始，
东京集成；
先后接力，
成此盛举。

现在我要说，那个话不止适用于讨论会本身，也适用于这部书的出版。日文本变为《对谈录》，准备工作几起几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负责同志热情支持，使之得以实现。倡议筹办和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日本朋友见到这个文本，我想也会感到欣快。

二

这部文集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些具体问题提出来了，还应该深入研究，使现有成果得到发展。从总体看，这部书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今年2月，我在一个会议的发言中引述了《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的基本论点。我说，

它是一部有分量的书，强调指出了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个性质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发言在《人民日报》上刊出以后^①，引起国内外的反响，议论见诸众多新闻媒介。虽然那些议论的中心并非为了讲这本书，而我们却可以看出它与评价这部书的直接联系。

国内的反响，是一致支持反驳日本当局的无理辩解，《中国青年报》所载《访刘大年》^②和《人民中国》8月号的《对谈》各有披露，不去细说。

国外的反响立论角度不同，但没有哪个评述是与书上的基本论点相左的。日本共同社播发记者伊藤正自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刘的讲话。天皇的责任问题在扩大》。其中说，“中国对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的反应是极力克制的。但对于日本国内重新兴起崇拜天皇的热潮逐步提高了警惕。可以说，刘大年的批评表明中国国内由于首相的发言而一举暴露出不信任 and 不满。”^③时事社发出评论：“竹下首相在国会答辩说是否为侵略战争，应由后世的历史学家作出评价，对此，中国和韩国等国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原国土长官奥野在去年5月因为讲‘日中战争是偶然发生的’而辞职。不难想象，

① 198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② 1989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③ 1989年2月21日，共同社电讯。

这次发生问题后，首相对奥野辞职会记忆犹新”^①《读卖新闻》2月21日夕刊登载黑字大标题的消息：“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判首相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发言”。《朝日新闻》在报道中，根据香港发回的消息，说我在发言时手里拿着《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这本书。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北京批评竹下登的讲话》。文中说，批评是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发出的，“竹下登被指责为违背了好些同意中国的说法的日本历史学家作出的结论，这种结论是：战争是以日本入侵中国为开端的。这些说法是很难反驳的”^②。苏联塔斯社政治观察家阿斯科尔德·比留科夫在长篇评论里说，“轴心国发动了反对人类的侵略战争，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联合国对这个事实所作的评价已载入遵循联合国大会所批准的国际法原则的纽伦堡和东京国际法庭材料”。刘大年的发言指出，“日本国内大部分历史学者以及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早就对那场战争（日本侵略战争）作出了一致的评价”。“日本当权人物不承认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固定评价的企图使人们怀疑他们能否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给自己忠于和平政策的保证的诚实性投下了让人怀疑的阴影”^③。美国纽约《中报》发表社论，批评日本当局自欺而不足以欺人。社论特地叙述：“刘大年以日

① 2月21日时事社：《大丧礼之前，为平息事态而努力》。

② 费朗西斯·德隆：《北京批评竹下登的讲话》，1989年2月22日《世界报》。

③ 1989年2月21日，塔斯社俄文电讯。

本新近出版的《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卢沟桥事件 50 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为例，说明包括编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兼亚细亚大学校长卫藤沈吉在内之多位日本学者，无不以日本侵略为定论”。社论并引述了远山茂树教授在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①

国外舆论如此强烈而又像一个声音一样讲出来的话，与我们评价这本书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第一，那些言论不是学术评论，更非某种书评，但是它们讲的基本论点，也就是《中日学者对谈录》的基本论点，不带支离含糊，更没有异议相左的地方。第二，那些言论中，或者指出本书的观点，或者直接引用《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这是明白无误，承认本书的可信性，或者说承认它的权威性。第三，对于抗日战争这段重大历史看法如此一致，说明本书的基本论点，不是少数历史学者一家或几家之言，不是少数人的私言，乃是世界各国众人之言，是天下之公言。由此可见，国际众多舆论媒介像一个声音讲出来的话，尽管不是为了谈论这本书，却又是一致直接充分肯定了这本书。这个事实是太明显不过了。天下的公言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人了解？一要有人宣讲，二要经过科学研究来宣讲。《对谈录》从科学研究来宣讲天下的

^① 1989年2月27日《中报》社论：《欲盖弥彰的裕仁战争罪行——再斥日本洗刷战争罪责之蠢行》。

公言，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常常被一些人认为缺少科学性，以至根本算不上一门科学。他们的理由是，不用说实用主义、庸俗无聊的东西了，严肃的历史著作也总要受到国别、民族限制，摆脱不了民族利己观念的纠缠。同一问题，各执一词，黑白真伪，难成定说。如果说，这种看法指出了不少历史撰述确实存在那种严重缺陷，但是因此就否定整个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只表现了学术上的糊涂观点或偏见。社会历史与自然现象不同，是由具有不同思想意志的人活动的产物，这并不能说明对它的研究就必然要存在非科学性。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都包含着矛盾，都需要具体分析。民族关系、民族感情就是一个包含着矛盾，特别需要分析的问题。关键在于研究者的指导思想、独立分析精神。《中日学者对谈录》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样板。日本学者的论文占全书三分之二，内容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意识形态、国际关系，作者尊重事实，独立分析，采取客观冷静态度对待民族矛盾、民族感情，使这些论文“不期然地构成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史论体系”^①。中国学者的论文，同样贯彻了客观分析，没有人可以指出其中有什么“民族狭隘性”。就因为这样，他们不约而同得出了基本的共同的结论。这

^① 1989年，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会报》，井上清：《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圆满成功》。

对于那种以为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不科学的观点，实在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在涉及民族关系、民族矛盾的重大历史问题上坚持科学态度，这一点，意义格外深长。

历史著作各种各样。《对谈录》不是一部讲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系统著作，但它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部名著，是一部由中日学者集体创作的名著。现在它已经受到重视，其影响今后也将要传播下去。

三

中国学术界研究抗日战争史，近年来出版了大量论著，但全面叙述那段重要历史的系统著作仍感寥寥无多。前几年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抗日战争学术讨论会上提过一个建议，主张集中力量写出一部比现有水平再高一些的抗日战争史的著作，同时编一部基本的资料书。著作要充分汲收中国、日本和世界各地研究这段历史的成果，在科学上具有权威性代表性；资料书则要求依据档案等原始材料，反映历史的主要过程。一部新水平的书，一部较为扼要完整的资料，可以推进科学研究工作，更可以满足现实生活中的需要。

写出一本全面的抗日战争史，是社会上不少人关心的事。今年二三月间，由于前面提到的那次讲话，我接到国内外大批热情洋溢表示赞同的来信，不少信上并提出各种建议和要求。写书便是一些来信的建议之一。一位居住巴

黎、谦称“愚侨”的陈庆怡（字强先）先生的来信，详细讲述了他对抗日战争过去快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关于写书，他说，“日本侵华战争性质的问题，原是不争之论。只不过日本自知罪恶深重，妄图掩耳盗铃，不肯承认而已。最好由中国邀集日本及战时遭受其侵略之害各国认识公道之历史学家，共撰一部《日本对外侵略史》，并请日本政府高明详列有关侵略之各种学说，同样邀集各国之国际法家，逐说论列，作为附录，战争半个世纪之后，足为公论。不宜再往后世推托”^①。陈先生的主张是值得重视的。题目、办法可以斟酌，而这项工作需要动手来做。尽管往后人们会多次写这样的书，而我们现在来写有现在的适当条件和必要性。“不宜再往后世推托”，这个话讲出了许多人的共同看法。

抗日战争的内容格外丰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特殊重要性。我们的研究要有具体项目。而又必须从更加广阔的范围来看待这个工作，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某个具体项目上。抗日战争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说，“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怎么空前，怎么伟大，那时只是一个概说，一种展望。5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说得全面、实在了。第

^① 陈氏来信上注明：John C. CHEN, 20r, de la Terrasse, 75017 Paris, France。日期是1989年3月13日。信的其他部分见1990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

一，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了中国走进社会主义。在那以前，每一次革命斗争、爱国运动各有功绩，却没有任何一次足以比得上抗日战争推进历史车轮的显赫功绩。第二，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下取得的。这些觉醒了的爱国力量，有今天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先辈，有海外一切关怀祖国命运的炎黄子孙。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研究他们共同斗争的历史，研究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空前觉醒的、爱国主义的历史。第三，抗日战争不止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重要性，在日本历史上也有极大重要性。中日两国都在这次战争中和战后发生了极大变化。中日两个国家、两国人民都可以而且完全应该从中日战争中学到非常重要的东西。睦邻友好、共同发展前进的道路，是中日两国关系上惟一应该遵循的道路。这是那场严酷战争给予人们的根本教训。第四，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中国抗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在亚洲和东方的胜利。论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忽视以至撇开中国抗日战争，就好像闭着一只眼睛看世界，不能见其全局。这不止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也涉及如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特别是东方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巨变。抗日战争的所有这些方面，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前的社会生活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全面深入研究它们，更多的了解这段未久的过去，对

于我们将能够更好的辨认历史前进方向，正确的分析、看待现在和未来。因此，今天不是要考虑这种研究是否差不多了，而是要讨论如何真正有计划地展开这方面的工作。

确认抗日战争的性质，关系到研究讨论的每一个方面。《中日学者对谈录》从科学上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出版中文本，对于我们要进行的具体项目和有关的广泛研究，都应该是有帮助的。一些对谈文章警醒生动，可以估计，众多的读者会同样感到饶有兴趣。